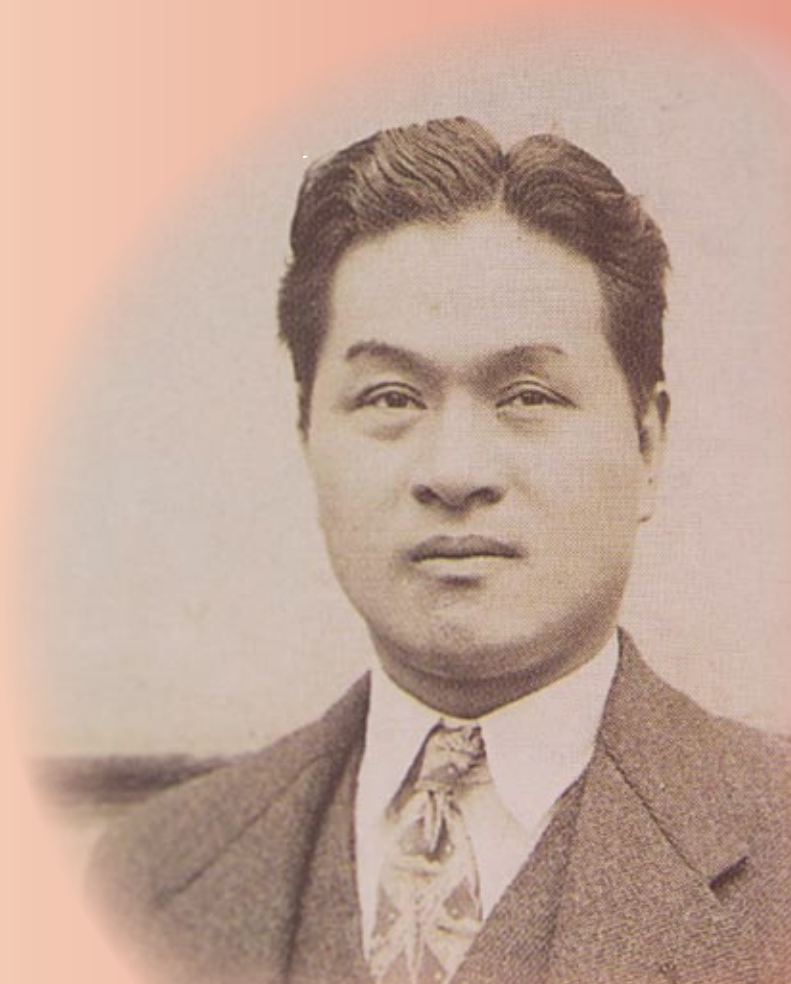


教育

堅毅不撓的辦學楷模

朱昭陽

1903~2002



國史館修纂處簡任協修

歐素瑛

撰文

## 摘要

朱昭陽校長（1903-2002）是延平學院（今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的創辦人，是延平的精神領袖，也是延平優良傳統的象徵。他在創校期間，雖波折不斷，但仍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堅持認真辦學。沒有朱昭陽，就沒有延平；沒有朱昭陽的堅忍，就沒有今日延平中學的發展。



## 壹、家世與求學

朱昭陽（1903-2002），臺北板橋人。祖籍福建漳州府平和縣。平和位在福建南部，鄰近廣東，是廣東客家族群分布的尾端，稱為「詔安客」。朱家第十一世祖名點，於清乾隆年間渡海來臺，落腳臺北石門，以墾荒務農為生。至祖父寬裕公時，自石門移居板橋，成為林本源家的佃戶。其後，改以釀酒為業，並自創品牌，所產「朱源隆」號紅酒，遠近馳名，累積資材，在埤仔墘、社後、中壠、觀音等地購置田產。日本治臺後，實施鴉片、鹽、樟腦專賣，1901年成立專賣局，更將煙、酒納入專賣，雖未禁止私人釀酒，但「朱源隆」號紅酒乃逐漸減產。此時因朱家已薄有田產，遂改以耕讀傳家。其父四海公精通漢文，為避開與日本人交往，遂遷居板橋近郊的埔仔墘（當時稱為「埤仔」，因位在蓄灌溉用水的大埤旁而得名）。當時因船隻可從淡水開進來，所以父親還做了一段時間的米店生意。碾米廠結束後，即退而讀書、教育子女。

父親四海公結過兩次婚，元配早逝，沒有生育，續娶陳氏諸，即朱昭陽之母，育有6子4女。其中，6子分別是驕陽、昭陽、華陽、明陽、彩陽、崑陽，皆受過高等教育，在當時堪稱異數；4女分別是阿凸、阿寶、阿璫、阿瑛，皆按習俗過繼給人當養女。朱昭陽早年隨父親習漢文3年，1910年8歲時，入學板橋公學校，每天打赤腳走半小時的路到學校，十分辛苦。板橋公學校的西式校舍為日俄戰爭後林本源家族與地方士紳捐資興建者，和臺北大橋公學校並稱為當時全臺最美麗的學校。當時上公學校尚不普遍，每一年級只收1班，每班約5、60人，學生年齡或7、8歲，或12、3歲，頗為參差，學校為使年齡較大的學生儘快畢業，1年級讀完即可跳升3年級，留下年紀較小的同學循序升級，課程以教授日語及普通常識為主。

板橋公學校畢業時，朱昭陽尚未滿 14 歲，只好先升入公學校實業科就讀，1 年後畢業，報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通過國語（日語）、算術兩科考試後，於 1917 年進入該校國語部。國語學校修業年限 4 年，每年招收國語部 1 班、師範部 4 班，每班各 40 人，共計 200 人。其中，國語部每月學雜費含吃住為 4 圓 5 角，師範部則完全免費，且畢業後又有工作，所以很多人就讀師範部，包括朱昭陽的大哥朱驕陽。

1919 年，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教育令」，規定廢止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改設臺北師範學校、臺南師範學校。對於總督府廢止國語學校之舉，朱昭陽頗為反對，在愛校心的驅使下，起而號召同學反對改制，並決定用罷學的方式表示抗議。此事被校長太田秀穗得知後，立即召集大家講話，述說學校改制的緣由，並勸說大家不要因小事激動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最後說：「你們一定要罷學離開學校的話，我也無能為力，但是回家之後，如果還想再回學校，學校還是歡迎你們回來繼續完成學業的。」聲淚俱下，頗令學生動容。不過，學生並未改變初衷，還是全部離開學校。回到家裡後，被家長痛斥一頓，第二天又乖乖帶著行囊返回學校宿舍，太田校長看到學生回到學校，果然實踐承諾，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也未追究責任。



◎朱昭陽（右）（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1921 年 18 歲時，自臺北師範學校國語部畢業，在大哥朱驕陽的鼓勵下，瞞著雙親，與好友曾人模同船赴日。在海上顛簸了 4 天 3 夜才到日本神戶，再從神戶搭了 10 幾個鐘頭的火車終於抵達東京，並在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前輩、就讀東京商科大學預科吳三連的安排下住進臺灣留學生住宿的高砂寮，雕刻家黃土水、畫家張秋海當時也住在這裡，也都是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前輩。在臺北師範學校校長平野象一的推薦下，朱昭陽插班進入東京私立麻布中學 4 年級。就讀不到 1 年，即以第一名成績擔任班長，旋又考上競爭最激烈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首開臺灣人子弟考上一高的紀錄。當時臺灣新聞界廣為報導，造成極大轟動，始獲得其父親之諒解，也開啟他 4 個弟弟赴日留學之路。



◎年輕時期的朱昭陽（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高等學校為日本戰前學制的特殊產物，具有大學預備教育與高等普通教育的雙重性質，旨在奠定學生之外語能力、基礎學科，作為日後進行高深研究的基礎。高等學校分為文、理兩科，文科以語言為主，以備將來進入帝國大學的文、法、經濟學部；理科分別主修數學、物理、化學及生物等，以備將來進入帝國大學理、工、農或醫學部。東京一高號稱是全日本最難考、且為全國菁英匯集的學府，學生有極高的理想，且自視頗高，自律心極強，完全發揮自由、自治的精神。一高求學期間，朱昭陽主修法文，副修英文。上課頗為自由，加上沒有升學壓力，有較多時間讀自己喜歡的書，從文學到藝術，從歷史到哲學，從政法到經濟，以及其他知識，都任由你去鑽研，任由你去充實。在學校獨立自主、自由放任的學風薰陶下，對朱昭陽的人格養成和思想啟迪皆產生深遠的影響。

1925年3月，朱昭陽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之所以選擇經濟學部，是希望將來從事學術研究，如有可能，想在大學任教，因為殖民地出身的人當學者較能依照自己的實力發展，加以對經濟學比對法學更有興趣。在教授中，對朱昭陽影響最大的是美濃部達吉（1873-1948）和矢內原忠雄（1893-1961）兩人，其中，美濃部教授是一位自由主義的學者，講授憲法，上課時滔滔不絕，旁徵博引，很受學生的歡迎，是當時日本憲法的權威，他倡導「天皇機關說」，認為天皇只是國家機關的幹部而已。而矢內原教授是殖民政策的權威，也是自由主義者，講授殖民政策，為了實際瞭解日本的殖民統治，曾到臺灣作為期一個月的調查訪問。

在東京帝大求學期間，朱昭陽因對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極為不滿，到東京不久，就在吳三連的引領下加入東京臺灣留學生組織的「新民會」，並積極參與各項活動，結識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諸先生，為支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爭取臺灣人的前途而奔走。大二時，朱昭陽通過極其不易的行政科高等文官考試。大三時，通過司法科高等文官考試及眾所矚目的大藏省（財政部）就職考試。以一個大學還沒有畢業的殖民地學生，連中三元，締造如此輝煌的戰果，可以說是日本教育史上少有的記錄，於是新聞爭相報導，造成很大的轟動，贏得日本人無比的敬重，也帶給臺灣人莫大的鼓舞，總算為臺灣人爭了一口氣。

## 貳、進入大藏省服務

大學畢業後，指導教授矢內原忠雄因極為賞識朱昭陽，欲留其為助手（助教），在當時雖是很難得的機會，但朱昭陽以答應大藏省在先而予以婉謝；但對矢內原教授的賞識和提攜之情不曾或忘。臺灣總督府也邀他回臺灣服務，但朱昭陽因不滿總督府對臺灣人的差別待遇而拒絕。

1928年3月，朱昭陽踏出校門，進入大藏省服務。最初被派在理財局調查課兼專賣局管理課，屬判任官（一至四等，相當於委任）。每星期一、二、三在理財局調查課上班，從事印度和阿爾及利亞金融政策的調查研究，寫了不少文章，發表在大藏省調查月刊上；星期四、五、六到專賣局管理課上班，從事勞動方面的研究，得到不少心得。1929年，與黃坤卿（1908-1994）女士在東京結婚，由李延禧福證。黃女士是臺南市人，出身書香門第，長榮女中畢業後，赴東京就讀明華齒科專門學校，與曾人模也是讀齒科的北港同鄉住在同一宿舍，因此得以與朱昭陽認識和結婚。婚後，夫妻鶼鶼情深，共同攜手走過65年的真情歲月，育有1女（秋月）、2子（耀沂、耀源），皆卓然有成。



◎朱昭陽（左二）與家人合影（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1931年，朱昭陽升上奏任官，月俸100多圓，調任專賣局大阪分局事業課副課長。日本官僚體制的特色之一是高級官僚調動頻繁，迄至1937年6年間，朱昭陽職位調動5次，歷任專賣局大阪分局事業課副課長，以及高崎分局、金澤分局、熊本分局、廣島分局等事業課長，平均1年多即調動一次。調動時眷屬都跟著走，當時小孩還小，尚未上學，省去換學校、轉學的麻煩，所以搬家對他們好像在看風景，沒什麼麻煩。此一期間，朱昭陽以工作表現來證明臺灣人的能力、素質絕不比日本人差。

1936年，日本廣田弘毅組閣，軍部掌控一切，軍國主義思想高張，侵華日亟，並以海軍大將小林躋造（1877-1962）出任第十七任臺灣總督，恢復武官總督，推行「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之政策，以臺灣作為日本南進政策的基地。1937年，朱昭陽離開廣島，轉任東京專賣局事業課長。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朱昭陽深為自己任職的國家與自己的祖國作戰而痛苦不已，置身在東京街頭的人潮中，看到日本人一次

又一次地歡送軍隊上戰場，聽到日本人一陣又一陣地為勝利歡呼，他卻感到無比的孤單與極端的悲痛。

1940年，朱昭陽轉任專賣局宇都宮分局長。1年後，宇都宮分局改為支局，朱昭陽調任東京總局管理課長。日本為強化南進政策，解決對中國戰爭，於1941年12月8日偷襲美國珍珠港，美、英等國對日宣戰。最初，日軍在太平洋及中南半島勢如破竹，相繼占領關島（Guam）、香港、菲律賓賓（Philippines）、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尼、新幾內亞（New Guinea），向西直逼緬甸、印度，向南威脅澳洲、紐西蘭。1942年6月中途島之役，日本海軍大敗，形勢才開始逆轉。其後美軍在太平洋發動反攻，相繼在所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塞班島（Saipan）、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殲滅日本海空軍主力。1944年10月，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元帥指揮美軍在雷伊泰島（Leyte）登陸，1945年2月，進入馬尼拉（Manila），接著空襲臺灣，登陸琉球，進逼日本。



◎壯年時期的朱昭陽（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朱昭陽（中）與宋進英（左）等人合影（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當戰火逐漸逼近日本本土時，1944年，朱昭陽升任專賣局總局主計課長，升上高等官二等，為日治時期臺灣人行政官的最高峰。然而，日本保守官僚竟然利用機構改制，將朱昭陽降調為群馬縣專賣局高崎支局長。此時與朱昭陽同期的日本人大都在大藏省擔任課長等重要職務，掌理國家財政金融。雖然官等、待遇並無差別，但對殖民地出身的朱昭陽作如此安排，顯然是一種歧視。此舉頗令朱昭陽感到憤怒和不滿，甚至一度考慮辭職，但轉念一想，戰時無法轉業，辭職勢必失業，生活馬上會發生問題，只好勉強走馬上任。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反而使朱昭陽因而免於戰爭的浩劫。當時朱昭陽單身赴任，每逢星期假日才回家。因身居地方主管，又接近農村，較方便購買地方農產品，減輕戰時物質匱乏之苦；也因家住東京，便於與臺灣旅日菁英聯絡。

1945年8月6、9日，美軍在廣島、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造成極嚴重的傷亡。戰爭如再持續下去，日本勢必走上毀滅之路，日本天皇遂於15日宣布戰敗投降，二次世界大戰終告結束。日本投降後不久，朱昭陽歸心似箭，急著想回臺灣，重整自己的家

園，為建設臺灣而努力，遂向大藏省提出辭職書，部分日本朋友認為放棄在大藏省 17 年的資歷損失太大，因而勸他不要辭，留下來。對於朋友和同僚的好意，朱昭陽只有心領了，其決意不計一切犧牲，不怕任何困難，甚至將大學畢業證書、高考及格證書等證件都棄置日本，決心放棄舊有的一切，重新開始。另一方面，與謝國城、宋進英等人發起組織「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獲推舉為會長，謝國城為副會長，總務課長宋進英、財務課長林迺敏、組織課長楊廷謙、調查課長郭德焜、文化課長曹欽源等，會員近 200 人，每星期六、日於明治學院集會，互相交換意見，並設中國語講習班，準備返臺後為建設家鄉而努力。

## 參、創辦延平學院

1946 年 2 月 2 日，朱昭陽舉家與魏火曜等六、七百位臺灣人，乘坐戰後第一艘從東京開至臺灣的遣送船——冰川丸，從橫須賀港啟航返臺。經過 4 天 3 夜的航程，於 2 月 5 日抵達基隆。足登故土，第一個感覺是回到家鄉真好，內心的興奮和激動非言語所能形容。接著，發現戰後臺灣的情況和日本沒有太大差別，戰爭的痕跡依然存在，急待重建。回到埔仔墘老家骨肉歡慶團圓以後，朱昭陽奉臺北市長游彌堅之命，接掌市立大同中學。該中學原是日人創辦的一所私立中學，位在大龍峒，日人遣返後，先由該校教師劉克明負責校務，更名為臺北市立大同中學，朱昭陽奉派為戰後第一任校長，因為學校沒有校舍，所以暫時借用今臺北市仁愛路的幸安國民學校教室上課，又特別請楊廷謙為教務主任，使校務漸趨正常化。

1946 年 3 月至 7 月間，應魏火曜之父魏清德之邀，協助整頓臺灣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今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臺灣合會儲蓄公司之前身係 1915 年創立之臺灣勸業無盡株式會社。1946 年 9 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將臺灣勸業無盡、臺灣南部無盡、東臺灣無盡、臺灣住宅無盡等 4 家株式會社合併改組為臺灣無盡業股份有限公司。當時公司的財務狀況差，設備也很簡陋，只有幾張桌椅和招牌，正努力重整、略見起色時，接收人員到來，朱昭陽乃卸下工作離開，由魏清德擔任總經理，「半山」的黃國書兼任董事長。1947 年 6 月，改稱為臺灣省人民貯金互濟股份有限公司。1948 年 1 月，再更名為臺灣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

朱昭陽的辦學動機起於少年求學時代，在日本求學、工作時，也常以教育桑梓為念，深覺要建設有自主性的臺灣、開創臺灣光明的未來，首在培育人才，而培育人才須

從辦學校著手。戰後回到臺灣以後，朱昭陽想在辦學之前，先在事業機構工作，有關單位見他過去在日本專賣局的資歷，就要他到專賣局上班，朱昭陽不想去，遂介紹剛由印尼回來的東京帝大後輩、曾任總督府專賣局煙草課長的林旭屏去，結果他卻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了，令朱昭陽十分難過，悲痛不已。其他事業機構的人看了他的履歷，覺得高職位輪不到他，給太低的職位也不方便，因此朱昭陽還是繼續擔任大同中學校長。

朱昭陽發現中國大陸來的接收官員，對教育似乎不像對權力、錢財控制得那麼緊。而「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回臺的人像魏火曜、高天成、陳茂源、曹欽源、陳成慶、林宗義等都在臺灣大學任教，辦學似乎是比較好的出路，於是更加強了朱昭陽辦學校的決心。要辦一所大學，師資較沒問題，研究會裡人才濟濟，欠缺的是學校建地和經費，所以在大同中學校長任上，一面努力讓大同中學上軌道，一面積極籌畫創校事宜。由於離開臺灣的時日頗久，社會上的人面不熟，所以必須找有力人士幫忙，經人介紹，認識了礦業界鉅子劉明。劉明是嘉義人，父親劉潤曾任山地通事，以經營山產、筍干聞名。1928年自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畢業後返臺，應用所學開礦冶金，成為「礦山王」。劉明急公好義，仗義疏財，一聽說朱昭陽要辦大學，非常贊成，所以很高興幫忙。他帶著朱昭陽跑遍臺灣各地，到瑞芳拜訪李建興，到基隆找顏欽賢，到中南部遍訪當地士紳，獲得大家的贊助支援。南部士紳建議先辦醫科，以後再辦文、法、商；朱昭陽說明要先辦文、法、商的理由，大家都答應幫忙；但承諾的捐款還沒有去收，學校就出事了，唯一收到的一筆捐款30萬元是永豐餘老闆何傳的弟弟何義捐的，作為學校臨時開辦的基金。

師資、開辦費籌集後，接著，就是校舍的問題。蓋新校舍需要龐大的資金，而且緩不濟急，所以想要從速開學，必須先借用其他學校的校舍，而借用其他學校的校舍，只能在夜間上課。更重要的考慮是，夜間上課才能提供日本殖民統治下失去上大學機會的民眾上進的機會，因此決定先從夜間部辦起。當時私立開南商工學校還在停課之中，校舍門窗破爛不堪，荒廢沒人管理。其負責人是臺北市參議會議長周延壽，和劉明是舊交。經商議開南商工的復校事宜後，決定由朱昭陽等負責開南商工校舍的修繕事宜，修復後的教室，日間歸開南商工使用，夜間歸大學使用。接著，朱昭陽請京都帝大畢業、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的開南校友陳有諒出任開南商工校長，劉明請官拜少將的「半山」、開南校友王民寧出任董事長，朱昭陽和劉明為開南董事，開辦大學的籌備工作大致就緒。



學校籌備就緒後，接著是籌組董事會。朱昭陽到霧峰拜訪林獻堂，請他擔任董事長，並為學校命名。林獻堂頗為認同朱昭陽的辦學理念，欣然接受出任董事長，為了紀念延平郡王鄭成功不畏強權、不貪名利、誓死反抗滿清、反對外來支配的民族精神，乃將學校命名為「延平」。因尚不足3個學院，暫時無法成立大學，故名「延平學院」，將來再擴大成為「延平大學」。延平學院的董事有林獻堂、黃朝琴、游彌堅、劉明、范壽康、許壽裳、李季谷、陳兼善、吳克剛、陳逢源、陳逸松、陳啟川、石錫純、宋進英等學界、政界人士，朱昭陽則擔任董事和校長。董事會的陣容可說頗為堅強，自然獲得社會各界的肯定。

依照規定，大學或獨立學院的設立，必須經過教育部核准，而當時教育部遠在南京，要到南京申請許可而後開學，實有困難。於是請教對中國政情較為熟悉的董事游彌堅，他建議比照中國大陸上常有的作法，學校先設立，招生開學後，再以既成的事實補辦手續。朱昭陽就照著他的話去做，於1946年9月正式對外招生。當時因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臺灣青年求知上進的慾望甚為強烈；加上社會上對延平學院期許甚高，報名非常踴躍，人數多達2千人，結果錄取1千多人。10月10日晚上，延平學院假開南商工學校操場舉行簡單隆重的開學典禮，1,100名學生在微弱的燭光下聆聽校長朱昭陽的訓詞：「在這一片漆黑的會場中，所幸有一支燭光帶給我們些微的明亮，我們學校在此時開辦，正是要給這混亂、昏昧的社會提供一線光明，我們要當荒野暗夜中的螢光。」臺灣人創辦的第一所大學就這樣誕生了，並以螢火蟲作為延平學院的校徽，希望延平青年能為臺灣社會帶來一些光明。

開辦之初，只有政治、經濟、法律3個學系，並分為本科（招收高中或舊制5年制中等學校畢業生，修業年限4年）、補習科（分為甲、乙兩班，甲班招收5年或4年制中等學校畢業生，修業1年；乙班招收4年或3年制中等學校畢業生，修業2年）。專任教師主要是東京帝大畢業的臺灣人，有朱昭陽、宋進英、朱華陽、邱永漢等5、6人；兼任教師大多是請臺灣大學教授來幫忙，有林茂生、林宗義、洪遜欣、洪耀勳、黃得時、蔡章麟、張漢裕、林朝榮、曹欽源、蘇維熊等，師資都是一時之選，也是臺灣人菁英的薈萃之所。同時，朱昭陽為專心辦好延平學院，辭卸了大同中學校長一職。延



◎延平學院招生報導（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平學院的1千多名學生大多是在社會上工作的成年人，部分已有相當的社會地位，有小學教師、校長、公務員及實業界人士等。他們雖然半工半讀，但都很自動自發，認真向學，而教師們大多懷抱使命感，教學認真，不敢稍有怠慢，唯恐辜負學生求知的熱忱，呈現一片蓬勃的朝氣。然而，開辦不到半年，臺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延平學院遂遭到停辦的厄運。

## 肆、二二八事件與延平學院被關閉

1947年2月27日傍晚，因查緝私煙而引發一連串反政府事件，民眾的憤怒由臺北逐漸延燒至全臺各地，導致民眾罷工、學生罷課事件，各級學校皆以安全為由宣布暫時停課，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則於事件發生翌日，即2月28日宣布臨時戒嚴，旋於次日，即3月1日因省參議員、市參議員、國大代表及參政員等之要求解除戒嚴，也有部分地區的青年學生加入武裝抗爭行動。2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臺北市中山堂成立，委員包含國大代表、參政員、參議員、人民團體，以及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學生代表等；3日，處委會除派代表往謁行政長官陳儀及尋求美國領事館之援助外，並決議由學生組成「忠義服務隊」維持治安。期間，各縣市警察局警員紛紛走避，青年學生乃成為維持治安的主力，並赴各地散播事件的消息，號召青年學生響應臺北之抗爭行動。9日，中央政府增援部隊整編第21師從基隆登陸，立即展開鎮壓緝捕行動，行政長官公署下令解散各地處委會，許多知識分子、學生被捕、被害或失蹤。10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再度宣布臺北市戒嚴，並於17日擴大實施於全臺各地。

2月26日，朱昭陽因丁母憂而趕回板橋埔仔墘老家奔喪。二二八事件期間，臺灣大學、省立師範學院、省立法商學院及延平學院各校宣布停課。延平學院的學生幾乎都參加了學生隊伍，並與臺灣大學、臺北商職、工職、成功中學、開南商工等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組成臺北學生自治會聯合會，參與示威抗議活動。3月2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後，延平學院、臺北商職、開南商工及臺北工職等校師生決議由學生負責治安維持工作，隸屬於忠義服務隊，由許德輝擔任總隊長，行政長官公署提供相關之經費、武器及交通工具等。6日，聽聞國軍即將來臺消息後，即將學生隊隊員名冊燒燬，繼於8日正式解散。當時朱昭陽在鄉下，交通既不順暢，家裡也沒有收音機，無法得知消息。9日，整編第21師登陸後，部分延平學院學生被殺，部分學生散掉了，沒人再敢提起是延平學院的學生。

幾天之後，軍隊開進延平學院，聲稱發現學校藏有手榴彈 70 餘枚、軍用汽油 5 大桶，以及「興華共和國」的旗幟，因而命令延平學院停辦。當時學校沒有軍訓課程，學校內部為何有武器？又為何有「興華共和國」的旗幟？顯然是可笑的栽贓式的罪名，只是命令學校停辦的藉口而已。3 月 20 日，開辦不到半年的延平學院遭到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辦理不善，且未奉准立案，二二八事變期間並有一部分學生參加叛亂，殊屬不法」為由，予以關閉。學校被關閉後，進一步要搜捕校長朱昭陽。其鄰居楊廷謙得知消息後，派他弟弟楊廷琦來通知，要朱昭陽不要回學校，也不要回新生南路的家，說有人要捉他。朱昭陽在辦完母親喪事後，就躲到最小的妹妹阿英在永康街的家裡。3 月 17 日國防部長白崇禧來臺後，希望會見臺灣的地方人士，劉明到處找朱昭陽去見他，朱昭陽聽到消息之後才出來，不過已經太遲了，白崇禧已經返回中國大陸了。

國防部長白崇禧來臺宣慰期間，曾召集臺北市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及學生精神訓話，宣布學生只要願意辦理自新，則既往不咎，一律從寬免究。但朱昭陽心裡還是怕怕的，因而與家人約定好，如果外出時有陌生人到家裡來，就在門外掛一條毛巾作為記號，看到毛巾就不要進家門，趕緊走避。最後，朱昭陽在林獻堂、游彌堅、劉啟光等人的說情下才得以無事。

## 伍、擔任合作金庫常務理事

1947 年 5 月 16 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改制為臺灣省政府，由魏道明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其主任祕書羅理是朱昭陽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時期的同學，因而推薦朱昭陽出任臺灣省合作金庫常務理事。二二八事件後，延平學院被關閉，劉明知道朱昭陽的經濟拮据，就向華南商業銀行董事長劉啟光推薦，聘朱昭陽為華南銀行專員，是一個閒差事，等於領乾薪。1948 年 3 月，進入合作金庫以後，就辭掉華南銀行的職位。



◎於合作金庫任職期間的朱昭陽（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臺灣省合作金庫之前身為 1944 年設立之臺灣產業金庫。1946 年 10 月，改組為臺灣省合作金庫，由臺灣省政府及業務區域內各合作事業團體暨農會、漁會、農田水利會等社股組織之，股本總額為舊臺幣 2,500 萬元，分為 25 萬股，每股 100 元，其中政府股

(公股)為15萬股,各社團股(社股)為10萬股。合作金庫採理事長制,由臺灣省政府派省教育廳副廳長謝東閔兼任理事長,立法委員劉明朝兼任總經理,2位常務理事分別由省民政廳副廳長、農林廳副廳長兼任。其後,民政廳副廳長返回中國大陸,羅理遂推薦朱昭陽補常務理事缺。理事長和常務理事中,只有朱昭陽專職上班,當時謝東閔還兼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所以很少到合作金庫上班,即使來了,也很快就走。他對朱昭陽頗為尊重,也很信任,事務多由朱昭陽處理。因此,理事會實際上是由朱昭陽主其事。

進入合作金庫服務不久,臺灣省政府財政廳長嚴家淦即透過立法委員羅萬俤轉達擬延請朱昭陽擔任財政廳副廳長之意,且不必辭合作金庫的職務,徵求其同意,但朱昭陽以無意仕途,請羅萬俤代為婉謝其好意。1949年9月23日,朱昭陽正在合作金庫處理公務時,突然有兩名陌生人走進來,強行將他帶走。他們既未表明身分,也未說明來意,朱昭陽當然不肯跟他們走,其中一人緊靠過來,暗地裡用手槍抵住朱昭陽的腰部,逼使他不得不跟他們一起走。到了樓下,有一輛吉普車等在那裡,朱昭陽被押上車,車子就開走了。當時有一位合作金庫同仁記下車號,經查問後,才知道是保安司令部派人來捉朱昭陽。吉普車一路開到省農林廳檢驗局,以同樣的手法,將在檢驗局擔任副局長的朱華陽(朱昭陽之弟)也捉上車,再把兩人載到西門町的東本願寺地下室,這是當年保安司令部專門用以拘押、審訊政治犯的黑牢。

在黑牢期間,朱昭陽和弟弟華陽過著非人的生活,每天三餐都蹲在地上吃,伙食僅足以苟延生命而已。晚上睡覺沒有床,眾嫌犯像沙丁魚一樣一條條排躺在地板上,擠得水洩不通,人多時要輪流睡。連上廁所也不自由,公共廁所只有1間,必須由獄卒在一定的時間帶隊上廁所。保安司令部不是司法機關,而是軍法機關,朱昭陽兄弟雖不是軍人,但時值戒嚴時期,一被捉進保安司令部就要接受軍事法庭的審問。法官是軍人,每一案件只有一位軍法官主審,審問不公開,不准請律師,也不准旁聽,一審就定案,既不得要求再審,也無合議制,更無辯護人制度。

幸運的是,朱昭陽遇到一位有良知、有血性的軍法官楊丕銘。楊法官和朱昭陽素昧平生,但對他的處境特別同情。入獄當晚,楊法官就召朱昭陽入庭,沒有審問,只是滿口安慰朱昭陽,要他不要太過憂慮,過不了多久就可以被釋放回家。在黑牢捱了近3個月,朱昭陽一直都沒有被審問。有一天,楊法官告訴朱昭陽說:「當年你們在東京所組織的『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的兩位幹部,副會長謝國城和財務課長林迺敏也先後被捕入獄,調查研究會在東京時的活動情形,二、三天後,他們都無罪釋回了。」1949年

12月31日，朱昭陽突然接到通知，說保安司令彭孟緝要見他，他到司令部去見彭司令時，劉明已在場等著保釋朱昭陽，彭司令訓話一番，並要求朱昭陽登報聲明解散「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接著，司令部的人要求朱昭陽寫一份「解散啟事」，並交給他一張名單，裡面羅列了「魏火曜、謝國城、曹欽源、郭德焜、林迺敏、宋進英、高天成、吳振坤、林宗義、李燧煤、王金茂、鍾啟安、林秀棟、江萬俤、張漢裕」等人，並要求名單上的這些會員也要在「解散啟事」上簽字。



◎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解散啟事（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實際上，「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的會員回到臺灣以後，各奔東西，從沒有再集會過，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所以朱昭陽答應保安司令部的要求，起草「解散啟事」。寫完後，即與劉明離開司令部，距離被捕之日整整100天。出獄之後，朱昭陽徵求上述會員的同意，請他們在「解散啟事」上簽名蓋章，然後在1950年1月登報聲明，宣布解散一個原已經不存在的組織。原來政府當局對留日歸國者深具戒心，「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的會員李中志，留日返臺後，在臺北市臨沂街占了一間日本宿舍，後來又到中國大陸經商，賺了一些錢，另外在延平北路置產，就把家搬過去，而把臨沂街的房子租給一位外省人住，這位外省人剛好是特務，檢舉李中志家的天花板有一張五星旗的宣傳海報，李中志遂於1949年9月被捕。接著，「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的重要成員：朱昭陽、謝國城、楊廷謙、林迺敏、陳成慶等都被捕。朱華陽雖非「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的會員，但因曾和李中志一起吃飯而受牽連，另外還牽連到廖瑞發等。結果謝國城、林迺敏拘禁2、3天就被釋放了；朱昭陽被拘禁100天；陳成慶300天；朱華陽、楊廷謙各6年；李中志、廖瑞發則被判死刑。

出獄後，朱昭陽回到合作金庫上班，恢復原來常務理事的職位。為了合作金庫的未來，朱昭陽特擬定發展方針，一方面擴大地方分支機構，開展業務；一方面積極培訓人才，儲備幹部，堅持本省人、外省人同一標準，公平起用臺灣人，結果遭人向臺灣省政府匿名檢舉，指其處理合作金庫人事不當。省政府派高級官員前來調查，結果查無實據，唯人事方面，對外省人似有歧視之處。最後這件事不了了之。1950年初，中國國民黨上級曾透過人勸朱昭陽入黨，其以剛出獄，心情尚未穩定為由婉拒。一段時間之後，曾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監察委員丘念臺，透過合作金庫協理謝國城勸朱昭陽入黨，朱仍予以婉謝。再過幾年，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行文臺灣省政府，指省合

作金庫常務理事朱昭陽無國民黨籍，實不適當，應予更換，甚至要求調查合作金庫理監事中尚有多少人無黨籍者。省政府將公文轉給合作金庫理事長李連春，李又把公文給朱昭陽看。朱昭陽決定不加入中國國民黨，內心早已做好離開合作金庫的準備，沒想到李連春的調查報告上去，指經查合作金庫理監事中，非國民黨籍僅常務理事朱昭陽一人。省主席俞鴻鈞批示：屬極少數，沒什麼不妥。事情遂不了了之。此後，朱昭陽在合作金庫服務 26 年，一切都很順利。

1952 年，合作金庫理事長謝東閔卸下職務，由省糧食局長李連春兼任合作金庫理事長。李連春在糧食局的工作甚為忙碌，對於合作金庫的事務並不多管，每天只有中午時間來合作金庫半小時左右。李連春對朱昭陽很客氣、很尊重，也很信任。在理事會上，朱昭陽經常獨當一面，在穩定中求發展，使合作金庫的業務蒸蒸日上。朱昭陽剛進合作金庫服務時，職員只有 100 餘人，業務大約只有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等省屬三商銀行的四分之一，業績則不及三商銀的四分之一。迄至 1974 年退休時，職員已增至 2 千餘人，業績更遠超越三商銀之上，其運籌帷幄之功，實不多讓。

在合作金庫服務期間，朱昭陽還兼任大同工學院（今大同大學）的教職，每週 2 節課，講授財政學、經濟學，並兼長延平中學。1969 年，辭去大同工學院的兼職。繼於 1974 年自合作金庫退休，全心投入延平中學的教育工作。

## 陸、致力復校：延平補校與延平中學

1947 年 3 月，延平學院關閉後，朱昭陽即致力於延平復校的工作，先是借用今金華女中的教室辦公。不久，軍隊住進該校，乃搬到劉明位在漢口街的振山實業社，不僅免收房租，還提供一切辦公設備。

當時合作金庫理事長謝東閔同時擔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副廳長，朱昭陽乃向他請教延平復校事宜。謝東閔很客氣地說他這個副廳長只是個閒差事，無公可辦，所以幫不上忙。朱昭陽轉而請求羅理協助，獲羅理鼎力支持。但當時省政府的權限僅及於設立中等學校的許可權，加以延平既無校址，也沒有校舍，所以只好以申請辦理夜間上課的「延平補習學校」為名，來從事復校工作。

最初延平學院與開南商工學校約定，由延平負責修繕教室，晚間開南提供教室給延平使用。可是延平要復校時，開校商工學校董事長王民寧為臺灣省警務處長，也是一位

中國國民黨員，不敢履行約定，拒不提供教室。幸好西門國小校長陳炳榕瞭解延平的創校精神，對延平極力支持，特地撥出一間教室作為延平補校的辦公室，其他教室也可以讓延平在夜間使用，教室問題才告解決。借用學校教室不必支付房租，也可節省許多設備費用，對財政困難的延平而言，有很大的助益。1948年9月，延平補校正式開學，招收高中補校生4班及專修班商科、法律等班。高中部按照一般高中課程標準授課，專修班為高中畢業後所修之課程，聘請學驗俱豐的教授來任教，包括臺灣大學教授黃春木、徐先堯、陳成慶、曹欽源、洪耀勳、洪遜欣、黃金穗、翁通楹、林渭川、師大教授陳蔡煉昌、中興大學教授林秀棟，以及社會知名人士李登輝、高湯盤、吳金川、施學習、朱華陽、謝國城、林鳳麟、李淦、許建裕、林滋培等，均曾不計名位，不辭辛勞，為教育下一代而欣然到延平補校任教。可惜的是，延平專修班沒有通過教育部專科學校資格的認可。因為專修班向教育主管當局申請的是1年制的職業教育，而學生的修業年限卻是3年。結果3年修習期滿後，只有合作金庫認定其專科畢業資格，其他機關則不予認定，以致就讀人數逐漸減少，因而不得不停止招生。加上1949年9月延平復校才1年，朱昭陽和弟弟華陽被保安司令部拘押，學校一時風聲鶴唳，副校長宋進英也在情治單位的追捕下躲躲藏藏，學校乏人管理，老師上課的精神也不如往昔，學生人數銳減，只剩下1百多人來上課，學校存在著嚴重的危機。



◎延平舊校舍（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1950年朱昭陽出獄後，為了確立學校未來的方針，乃召開校務委員會。時值中國大陸淪陷，社會不安之際，多數委員對學校的前途失去信心，紛紛主張解散學校，但朱昭陽堅決主張繼續辦下去，結果大多數委員離去，只有宋進英留下。宋進英畢業自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研究羅馬法，曾兼任臺灣大學法學院教授、大同工學院教授，其長期以副校長身分兼教英文，協助朱昭陽推展校務，不遺餘力。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後，美國派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臺灣社會漸趨安定，延平補校也逐漸恢復昔日景觀，並開始著手找尋校地和募集款項。就找尋校地來說，在合作金庫常務理事任內，業務上與臺北市農會常有接觸，與當時市農會理事長許江富成為知心好友，他對朱昭陽創辦延平的精神非常瞭解和支持，在他的大力協助下，市農會理事會同意撥出該會在建國南路的3千坪土地租給延平作校地，租金依照公有土地租金

標準。接著，到處募款。剛好一直很愛護朱昭陽的總督府國語學校學長、也是延平董事的吳三連擔任臺北市長，朱昭陽登門求助，他慨然答應，只要市議會通過，就可撥款補助延平興建校舍。於是朱昭陽專程拜訪市議員，爭取他們的認同與支持，市議會終於通過特別補助延平建築校舍費用新臺幣 20 萬元，占總工程費 40 萬元的二分之一，開市政府補助私立學校的先例。1953 年，延平校舍興建完成，學校搬到新校舍，師生均雀躍不已，這是延平第一次擁有自己的家。其後，市農會以政府公告地價每坪約 200 元，低於市價 10 倍的價格將校地賣給延平。有了校舍、校地，對延平往後的發展幫助很大。

1953 年 6 月，朱昭陽等再嘗試恢復延平學院，延平補校董事會會議決議向政府申請設立延平商業專科學校，並正式成立董事會，董事成員除原延平學院的林獻堂、游彌堅、劉明、黃朝琴、朱昭陽之外，再增加林柏壽、謝國城、劉啟光、楊亮功等人，並推舉林獻堂為董事長；黃朝琴、游彌堅為常務董事。林柏壽立即帶頭捐款並應允贈與林口的土地 37 甲。不過此一申請案，仍遭到否決。

延平補校的學生由最初 6 班 300 人，逐漸增加至 50 幾班 2 千餘人。1959 年，補校日間部改制為中學，初中部很受到社會的肯定，入學競爭激烈。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後，按學區入學，但很多家長為讓子弟進入延平，紛紛把戶口遷至延平學區內，產生超額現象，教育局於是規定採登記入學方式，以舊居者優先，其餘以戶口遷入先後為序。因登記人數太多，每年教育局都需派 6、7 人到該校坐鎮監督。其後，教育局改變入學方式，改採抽籤方式入學，抽籤時，教育局人員親臨坐鎮，避免發生爭端。延平中學初中部的升學率頗佳，學生考上建中、北一女、附中、成功者，每年都達到百人以上，留校升高中者反而較少。是故，朱昭陽決定加強高中部，自 1980 年起，鼓勵初中部畢業生直升高中部。第一屆直升班 48 人中，考取臺灣大學者 15 人、國立大學者 30 人，不輸建中、北一女，成績斐然。由於辦學績效良好，直升同學參加大學聯考的錄取率幾達百分之百，因而自願直升高中部者大為增加。

朱昭陽認為要想辦好一所學校，一定要有優秀、負責的老師。私立學校的老師，不由政府派任，而由學校自行聘用。校內設有教師聘任委員會，聘任合乎一定標準以上、教學認真的老師，不講人情關係，歷屆董事會亦未干涉學校人事。同時，延平不僅聘任好老師，還要能留住好老師，由改善老師待遇、安定生活環境著手。由於政府限制私立學校的收費，補貼又少，以致私校財政普遍困難，老師待遇要高出公立學校實在不容



易，因此改採多工作、多兼課、多收入的方式，加重老師、員工的工作負擔，收入自然比公立學校高。而且，延平中學也有和公立學校相似的退休和保險制度，使老師都能安心地作育英才。

有了好老師，就能教出好學生，學校按規定錄取學生，不論是一般平民子弟，或是權勢豪門子弟，一視同仁，一律給予平等待遇，絕無分別。同時，延平多元的文化，提供了學生適性發展的空間。在學科方面，學生熱心參與各式學術研究，校際競賽屢獲亮麗的成績。而課外活動使學生的學習更加多姿多彩，各種社團活動種類多樣且具趣味性，充分展現學生的特殊才藝，激發潛能，發展群性，以及培養正當的休閒活動觀。

在全校師生共同努力下，學校教室和設備一再擴充增建，創刊《延平青年》，並相繼設置視聽教室、音樂教室、電子教室、工藝教室、生物教室、物理教室、化學實驗室等特別教室，學生人數和素質也逐年提高，校務蒸蒸日上，成為一所聞名全國、日夜間部學生（含補校）達5千餘人的中學。



◎朱昭陽閱讀《延平青年》月刊（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 柴、薪火相傳

朱昭陽自擔任延平學院院長及延平補校、延平中學校長以來，秉持理想，作育英才，數十年如一日，奮力不懈。1989年，朱昭陽從擔任滿40年的延平中學校長職位退休，轉任董事長，以迄辭世。其退休後，延請校友栗竹松（1938-1995）接任校長，薪火相傳。栗竹松是延平補校日間部高中第一屆畢業生，臺灣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於1962年返回母校延平中學任教，旋兼行政工作，從庶務組長、主計主任、副校長、代理校長，到1990年8月真除校長。栗竹松秉持「誠以待人，忍以治事」的原則，以臨淵履冰、苦幹實幹的精神來辦學治校，為延平再創新的高峰。1995年，栗校長因公殉職後，聘請林正國（1946-）繼任校長。林正國為延平中學高中部第四屆校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於1971年應朱昭陽之邀返回母校服務，一路從地理老師、

庶務組長、註冊組長、總務主任到教務主任、校長，在「一切為教學，一切為學生」的理念下，要求一流的師資，課以一定的責任，進而建立一所具有特色的優質私立學校。

朱昭陽一生自奉甚儉，布衣粗食，擔任延平中學校長期間，從未支領過學校的薪水，只以辦好學校、培養人才為志。二二八事件後，延平學院被關閉，學校財政頓時陷入困境，朱昭陽遂將其合作金庫所領薪俸全部捐給延平，以維持學校的經營。1974年自合作金庫退休時，將全部退休金，湊足新臺幣250萬元，捐獻給延平設置「昭陽育英獎助學金」，繼續栽培獎掖後進，這樣棄私為公，數十年來履行其崇高理想者再無法找到第二人。1988年延平改建校舍大樓時，朱昭陽也率先捐出100萬元，其熱愛延平的心，總是與行動一致，更指出：「延平不是屬於任何一個人的延平，是全體師生、全體校友，以及關心學校的社會大眾所有。」無私的胸襟，令人肅然起敬。



◎伉儷情深的朱昭陽夫婦（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朱昭陽是一位剛毅木訥、「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堅持原則、有守有為、風骨嶙峋的長者。他寧可放棄做官、發財的機會，也要與延平中學長相廝守，以辦延平中學作為終身的事業，因為他認為：「生命的意義，不在當大臣，而在培養大臣。」當時延平中學不僅是作育英才的搖籃，更有一股清流，為私人興學立下不朽的典範。目前延平中學畢業校友遍及臺灣政商各界，包括義美集團高志尚、福華飯店總裁廖東漢、立法委員王雪峰等人，就連前總統李登輝也曾是延平中學的教師。



◎總統褒揚令（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提供）

由於延平標示著臺灣人創校的艱辛，引起許多關心人士和社會大眾的共鳴。1993年，在翁金珠立委的推動下，立法院通過延平學院復校的提案。此舉重新燃起朱昭陽和延平校友的期待。1997年，翁金珠等7名立委提案，修訂「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8條，增訂「對於事件中受害的教育文化機構，得申請回復名譽，政府並應協助其復校。」延平學院復校的可能性又向前邁進一步。2001年5月，朱昭陽設立延平學院復校籌備處，同年11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通過回復延平學院名譽之決議。2003年8月，延平學院終於獲得回復名譽證書。

2002年2月，朱昭陽去世前的12天，次子朱耀源記錄下父親最後的願望：延平學院的復校，以及感謝數十年來支持延平的友人名單。2月14日，朱昭陽過世，享壽百歲。朱昭陽是延平的創辦人，是延平的精神領袖，也是延平優良傳統的象徵。沒有朱昭陽，就沒有延平；沒有朱昭陽的堅忍，就沒有今日延平中學的發展。

### 參考文獻

- 朱昭陽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1994）。*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 延平中學（主編）（1996）。*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北市：編者。
- 傅素芬（主編）（2003）。*螢光曲：延平之父朱昭陽之歌*。臺北市：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
- 朱耀源（主編）（2006）。*不滅的暗夜螢光：承先啟後六十年的延平學院奮鬥史*。臺北市：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

